

导言

现代化视野中的调适思想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段。其时 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索，开始深入到政治与文化革新的层面，而其革新思想则有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之不同取向。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为此两种思想路向的代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可以美国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与“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的分析架构来概括。按照台湾学者黄克武的分析，近代中国的革命派倾向“转化类型”，主张以一套高远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世界，以达到“拔本塞原”的目的。他们多以为历史有两个阶段，一为完全成功的将来或当代的欧美社会，一为彻底失败的当代中国，而历史上成功的例子使他们乐观地相信理想终将实现；改革派则倾向“调适类型”，以为不可只看理想而不顾现实，因此他们主张小规模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革新，并反对不切实际的全面变革。

近代中国知识界之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分歧，论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和卢梭式的法国民主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版，第 5、6 页。

主义两种西方思想传统。诚如萧公权在论梁启超思想时所指出的：“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橥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民权的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 S. Mill）毋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 J. 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① 洛克和卢梭作为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思想代表，代表了近代西方两种思想传统，以及西方现代化的两种路向。关于英国式调适思想与法国式转化思想，西方学术界有深入的分析讨论。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经验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析框架，将推重个人自由权利、分权主义、片断渐进的试探式改良与崇尚社会平等、直接民主、整体性的急进革命归为洛克式英国思想与卢梭式法国思想的基本分野。^② 哈耶克（F. A. Hayek）则将英法思想传统归为“演化”与“建构”两种类型。在他看来，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演化论传统把文明进化视为一个历史传统的自发演化和试错的过程；而卢梭式的建构论传统则把文明进化视为理性建构的产物。上述西方两种思想传统，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中，显然泾渭可辨。

关于近代西方之调适传统与转化传统的分野，世纪初维新派思想家已有相当自觉的认识。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将

萧公权：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4 年版 第 2、3 页。

参阅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参阅 [美] 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 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革”诠释为英语 Reform(改革)与 Revolution(变革)二义。改革意谓“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 1832 年之国会改革。变革则“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 1789 年之大革命。改革与变革的区别还在于改革主渐变变革主顿改革主部分变革主全体改革为累进之比例变革为反对之比例。^①显然，梁氏在此已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英伦式调适路向与法国式转化路向的区别。严复则进而梳理了西方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之学理的分歧。严氏在《政治讲义》中指出以柏拉图、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言治本于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则本历史而言治。^②严氏在此已深刻揭示了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之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两大传统的歧异。

清末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以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思想为代表，其反映了改革派与革命派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取向。从维新时期到革命时代，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激进化的思想迁流过程，转化思想渐成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而调适思想则日益退居时代思潮的边缘。长期以来由于近代史学“革命范式”的教条化羁限，近代思想史研究一直存在盲目崇拜转化思想的倾向，调适思想则成为主流思想史之外被遮蔽的思想现象。80 年代以来，随着近代史学界对“革命范式”的反思和“现代化范式”的形成，学术界开始注意主流的转化思想以外的思想状况。在现代化视野中，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呈现新的图景。重新评估调适性现代化取向的意义，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饶有意义的重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8 页。

卢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7 页。

要课题。

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潮具有复杂的思想谱系和人物谱系。黄克武在一项关于梁启超调适思想的出色研究中指出，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与文化修改的辩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光谱，调适思想和转化思想分别处于光谱的两端。梁启超与谭嗣同的思想，则为清末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在此思想光谱的两端之间，则有调适与转化相交织的诸种不同的思想面貌。如孙中山思想之以转化为主而调适为辅的复杂性。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以及维新派的思想影响日渐式微，但调适思想仍不绝如缕，且于民国宪政初立之际还一度趋于活跃。民初调适思潮的重要人物有杜亚泉、章士钊、李大钊、蔡元培等。其中以杜亚泉的思想尤具典型意义。如果说梁启超与谭嗣同分别代表了清末思想光谱之调适和转化两端，那么杜亚泉与陈独秀则可谓民初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代表。民初知识分子的调适思想具有纷繁复杂的形态，往往一个人的思想成分和思想过程中兼有两种倾向，如胡适的政治调适与文化转化思想，蔡元培的政治转化与文化调适思想；章士钊思想有从转化到调适的演变，李大钊思想则有由调适而转化的递嬗。杜亚泉调适思想的典型意义，在于其思想的逻辑一致和先后一贯。杜氏的调适思想不仅融贯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等一切观念中而且终其一生而旨趣未变。杜氏思想可谓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纯正的调适传统。杜氏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正是五四知识界调适思潮与转化思潮分歧对峙的思想表征。

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近似于英国式自由主义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 192 页。

与法国卢梭式民主主义 但其亦有本土思想传统的深厚资源。黄克武指出,转化思想与调适思想,与钱穆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经术派”与“史学派”的区别不谋而合。经术派王安石偏于理想,主张依据经典从事彻底改革;史学派司马光则偏于现实,主张逐步改良。^①关于法国式转化思想与中国思想的亲和性,近年来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反思。人们意识到,中国思想中儒家的乐观人性论、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与卢梭思想具有某些相似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思想传统是多元的,调适思想同样亦不乏本土思想资源,洛克式的英伦自由主义与中国思想亦颇多亲和的因素。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想是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其可谓一种中西合璧的“儒家自由主义”。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或者说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五四以降思想界多有讨论。如蔡元培对儒家“忠恕”的自由精神、“中庸”的调和取向、“和而不同”的宽容思想的强调,李大钊则以古典“君子”比附现代“绅士”。张灏、林毓生等海外学者对儒家之道德自主取向的自由主义意蕴,亦多有阐扬。刘军宁则注意到哈耶克对儒家知识论传统的欣赏,并且指出孔子对无知的关注“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怀疑论传统隐然相合。^②本书通过杜亚泉思想个案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中国思想中的中庸思想、阴阳学说、宽容精神和不可知论,是民初自由主义调适思想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近代中国调适思想之中西交融的特性,既表明中国思想与英伦自由主义的亲和性,也规定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本土思想限度。这种“非弥尔式的自由主义”或“儒家自由主义”,以异于西方的非个人主义和非二元论为其

①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5页。

② 刘军宁 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代序。

本质特征，它承袭了中国思想的和谐传统。近代自由主义的这种中国特质，可谓梁启超、严复、杜亚泉、章士钊、蔡元培等人思想的共同特征。

调适性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方案（黄克武语）。五四以后，杜亚泉及其调适思想亦渐为 20 世纪激荡的中国历史所湮没。长期以来，杜氏在思想史上一直被归为“中体西用”派的保守主义者，这种偏见甚至沿袭至今。9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转化思想和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检省，发掘久被主流思想史遮蔽的调适思想的理论遗产，重估调适性现代化路向的历史意义，成为世纪末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趋势。杜亚泉思想的再发现，其意义即在于此。1993 年 10 月，田建业等选编的《杜亚泉文选》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为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杜氏文集。王元化先生为文集撰长篇序文，文中力辟陈见，首次将杜氏归为进步的自由主义启蒙学者，并提出现在应对杜氏进行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和再估价。序言明确肯定杜氏温和渐进的改革思想，指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近代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①“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①显然，王元化在此已准确揭示了近代中国转化思想（彻底改革）与调适思想（温和渐进改革）的对立，以及在改革进程激进

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5 页。

化的时代背景下调适思想边缘化的原因所在。王文是建国以后第一篇对杜亚泉思想作公允平实之评价的论文，其可谓 90 年代杜亚泉研究的开山之作。同年 11 月，上海历史学会于杜氏故里绍兴上虞，举行全国纪念杜亚泉诞辰 120 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虽以纪念为主而学术成果有限，但会议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杜亚泉思想的再发现和再评估，表明了世纪之交学术界重建百年思想史的努力。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演进，证明了人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复杂辩证的互动关系。时代的潮流有时并不等于思想的价值，立基于普遍社会心理的主流社会思潮，有时并不等于思想的真理，而理性的思想则往往为时代所遮蔽和湮没，尤其是五四这样社会普遍追求“彻底”的激进的时代。思想的真正价值与其说在于合乎时代之潮流，毋宁说在于经过历史的汰洗而不失其真理性。真理往往不合时宜，因其品性在于远离狂热的冷峻的理性。百年中国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消长隆替，表征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曲折，表明了历史与思想之复杂的辩证关系。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回眸中，重新阅读杜亚泉及其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世纪初一位被冷落的智者及其被湮没的思想智慧。这一曾遭历史拒绝的边缘的思想，直至 20 世纪尘埃落定的世纪末，方成为一分迟到的思想遗产。

第一章

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背景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9月14日生于浙江绍兴会稽县仓塘乡(今上虞市长塘)一商人家庭。同年出生的近代重要思想家有梁启超。

杜氏生性颖悟,自幼勤习举业。1889年16岁时考中秀才。翌年离乡入绍兴从名士何桐侯受业,致力于研习清初大家之文。1891年,杜氏应乡试落第,始弃帖括之学而转从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学,攻读许氏《说文》。1894年春,杜氏赴杭州崇文书院学习,秋试后归里。时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杜氏应岁试,考经解取全郡第一名。其时,杜氏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萌生爱国忧患意识,思想上渐生以讲求实学而济世救民之转变。据杜氏自述:“甲午之秋,中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蹙然忧之时,方秋试将竣,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汨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①

此后,杜氏以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而翻然改志,绝意仕进,并改习数学。此为杜氏研习科学的开端。经过两年刻苦自学,杜氏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杜氏治学方向之由经史训诂而

《亚泉杂志》第10册。

数理科学的转变，是清末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型的缩影。而且，杜氏的这一学术转向，又异于梁启超等同时代人文型新知识分子。这使杜氏奠定了近代知识分子中罕有的人文数理兼通的广博知识结构。

1898年，杜氏应蔡元培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及理科教员。3月岁试杜氏考取全郡算学第一。此后还兼习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学，并自习日文。其时，杜氏遍读上海制造局所译理化诸书，无师而自通。在近代科学先驱者中，杜氏为难得的自学成功的典范。这一时期，杜氏由阅读日文书刊而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中国传统学说渐生怀疑。

1900年，蔡元培因与中西学堂校董会思想不合，而辞去学堂监督职务。杜氏亦随之辞职离校，转赴上海，自号亚泉，创办亚泉学馆，编辑《亚泉杂志》，提倡科学。自此杜氏开始了其著述生涯。“亚泉”之意，杜氏自谓：“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①《亚泉杂志》为半月刊，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内容多为数理化学论文，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期刊。未久，杜氏在上海开设普通学书室，改《亚泉杂志》为《普通学报》，自任主笔。学报注重科学，兼载时事政治。

1902年夏，浙江南浔浔溪公学发生学潮，蔡元培应邀赴校调停，杜氏偕同前往，并膺校董庞清臣之聘，出任浔溪公学校长。杜氏长校后锐意革新，为实现其教育理想而不辞劳瘁。未久，学潮复起，杜氏周旋劝导无效而辞职。同年，普通学书室由于杜氏胞弟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境，《普通学报》仅出5期即停刊。翌年，杜氏离沪返绍兴，与人创办越郡公学，后因经费支绌而告停。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新社会》6卷2号。

1904年，杜氏应旧友张元济、夏粹芳之邀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并将营业疲顿的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印书馆。自此在商务服务近30年。其间杜氏勤于著述，商务出版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大都出于其手。杜氏入商务馆后，治学益广，研究领域除自然科学外，还及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1906年秋，杜氏曾偕叔父杜海生东游日本考察教育。

1911年春杜氏兼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自此开始了其思想家和新闻评论家的生涯。《东方杂志》创始于1904年，其初仅汇编和介绍国内外时事及报章论文。杜氏主持笔政后对《东方杂志》实行重大改革，从东西文报刊取材，详备译述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像和学术文化思潮，从而使《东方杂志》面目一新，销量激增，成为民初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物。杜氏主编《东方杂志》9年间，尽瘁著作，曾以“伧父”、“高劳”等笔名撰写论文、时评、译文等约300余篇。民国初年，国人对民党与康梁派论争以来的党派政论渐见厌弃，而青年的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日益发展，亟需舆论界之诱导。杜氏有鉴于此，乃于所主编之《东方杂志》撰著不染政党色彩，纯以学理国情为根据之政治论文，更详述世界大势，翻译东西名著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①。杜氏及《东方杂志》之超然独立、注重学理的文风，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相近，且二者在思想取向上亦同属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调适传统。

从民国元年到五四，杜氏主持《东方杂志》笔政的9年，为其思想生涯最重要的时段，其时亦值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关键时期。杜氏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命运，都与此时代环境有关。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新社会》6卷2号。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杜氏温和理性的调适思想与《新青年》激进转化的启蒙思想渐生抵牾。1918年秋冬，陈独秀与杜亚泉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上发生东西文化论战，这场论战标志着民初思想界在文化革新问题上转化思想与调适思想的深刻分歧。五四运动以后，转化思想在知识界日益风行，而调适思想则在急进的社会进程中日渐边缘化。其时，杜氏及《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相左的温和保守态度引起商务当局的不满，馆方虑及商务馆声誉及营业，力促杜氏改变观点及编辑方针。杜氏无意随波逐流，遂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

杜氏离开《东方杂志》后，仍回商务编译所专事于理科编辑工作，从而结束了其民初舆论生涯。杜氏退出舆论界后，仍未停止对思想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20年代，杜氏曾多次参与知识界的文化论争，如与蒋梦麟的新旧思想论争，与余云岫的中西医学讨论，与李石岑的新旧伦理辩论，与朱光潜的情与理的争论。在讨论中，杜氏仍坚持其中西会通、新旧融合的调和思想，以及以理智支配欲望、理智与情意和谐的文化观。这些论争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杜氏与陈独秀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

杜氏晚年在科学著述之余，有《人生哲学》和《博史》出版。其中《人生哲学》尤为杜氏晚年精力所萃之作，书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推重。1926年，杜氏为实现其教育理想，斥资创办上海新中华学院，后因经费困难而停歇。杜氏为此耗尽积蓄，仍负债累累。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炮火焚毁，杜氏率眷避难还乡。沪战后，商务馆遣散编译人员。杜氏离馆后在乡间仍组织原商务编译所同事，从事科学著述工作。翌年，杜氏因患肋膜炎而病逝穷乡。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一位科学先驱、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其倾毕生精力于传播科学知识、普及文化教育和启迪国民思想。杜

氏一生成就大者，尤在其科学著述事业和《东方杂志》的知识启蒙。杜氏世纪初以来创办科学刊物《亚泉杂志》、《普通学报》入商务印书馆后编著了百数十种科学教科书，奠定了其“中国科学界的先驱”（胡愈之语）的地位。而其主持《东方杂志》笔政期间所发表的大量政论和思想文化评论，以及其倡导的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使其成为民初有影响的调适派思想家。

杜亚泉思想生涯所经历的清末民初，是 20 世纪中国重要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时代。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全面的政治秩序危机和文化秩序危机。如何通过政治与文化革新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转型时期的时代课题。清末的改革运动经历了一个激进化的过程，然而从维新时代到革命时代，王朝的维新败局和民国的“共和幻象”，一再陷中国现代化于危机之中。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路径的选择，是其时知识分子求索的中心课题。辛亥民国的流产，再度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范型的危机。民初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使清末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分歧再度浮现。同时，20 世纪初又是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清末民初的时局离乱和文化失序，却为思想自由与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宽松环境。而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流，则成为激活传统和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这是一个思想创造的时代。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多出于这一时期，决非偶然。

从 19 世纪末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阶层有一个由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1905 年废除科举，晚清以来兴起的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成为教育的主流，延续千百年的“士”由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学校现代教育、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与熟习儒家经典“学而优则仕”的

士大夫，在知识结构、文化心态和社会功能上均迥然相异。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伴随着一个知识分子疏离政治权力的边缘化的过程。杜亚泉是脱胎于“士”的转变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杜氏生长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活动于“全国交通之毂辐”、“欧化输入之第一步”的上海。早年得风气之先，弃仕途转而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从而由秀才转变为现代学者。作为转变代知识分子，杜氏旧学新知兼备，且具有不同于梁启超等同辈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其一，杜氏接受西学新知，由科学而人文，广涉文理百科，这使其具备了完整的现代知识结构。而这种完整的知识背景，也是严复、胡适、丁文江等调适派思想家所共有的。其二，杜氏广博的现代知识，全凭自学而获得，而并未通过新式学堂或海外留学的正规教育。如此秀才出身的自学成功者，在转变代知识分子中可谓奇迹。其三，杜氏为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中一名典型的学者，他一生淡泊名利，独立超然于政治，而以科学、教育和舆论为业，因而比那些脱胎于“士”而投身清末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较少士大夫意识，而更富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杜亚泉生性冷静深沉，其以“亚泉”自号，表示其冷淡而不体面。据蔡元培忆述，杜氏“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而讨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诚，激不可遏”。^①“君身颀面瘦，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②杜氏冷峻理性和沉思默想的性情品格，使其在精神气质上远离浪漫空想，而更契近于罗素所谓英国式“冷头脑派”经验主义调适思想。

①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新社会》6卷2号。

② 蔡元培：《杜亚泉君传》，《杜亚泉文选》第3页。

杜亚泉由‘士’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知识结构，以及其理性深思的精神气质，使其思想具有中西综合与理性周详的特点。杜氏调适思想的形成，受到传统与西学的相互影响。其中，儒家中庸思想、阴阳学说与西方自由主义、科学思想，为其主要思想资源。这使杜氏思想兼备现代精神与东方特质。杜氏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折中综合的辩证性与中和性，其贯穿于杜氏的人生观、社会观和文化观，及其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索。杜氏的调适思想，显示了中西思想深刻的交互影响，以及中国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活力。

第二章

通向民主之路

民国初年作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创始阶段，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实验时代，又是一个民主流产的‘共和幻象’时代，其中蕴含着预示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曲折性的原初历史经验。然而，民初宪政历史和思潮之意义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而且以往关于民初政治思潮之有限的研究，亦多聚焦于国民党之共和主义与进步党之国家主义的政见歧争。实际上，这种党派意识形态歧争并非民初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图景，在此之外还有诸多超然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杜亚泉的温和渐进的改革思想，即代表了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另一种思索。

1. 接续主义 在保守中求进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新生的民国开始了创建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实验，缔造民国的改革者一举移植了包括政党、宪法、议会、总统、内阁在内的几乎一整套西方式现代政治制度。然而，袁世凯的弄权独裁，很快给表面辉煌的民初宪政实践蒙上了阴影，使民国流为‘共和幻象’。迫于袁氏武力而退居权力边缘的革命派，则试图通过议会政治抗衡袁氏独裁，进而重掌民国政权。袁世凯与革命派的矛盾，使民国自始即潜埋下深刻的政治危

机。另一方面，民初的政党之争亦滞碍了宪政秩序的建构。其时国会内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互以“民权”“国权”抗袁拥袁相对立，政见歧争复以党派恩怨相纠葛，两派势若水火，互不相容，遂演成国会内同室操戈之局。张君勱事后曾感慨万分地谈到：“民国政治，设若中山与任公携手，必然有所不同。”^①尽管民国模拟西方共和政体的宪政实验显得生机勃勃，但民国政治家们并未能超乎党派之见，而真正达到对民主宪政规范的认同。而这种民主规范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精神，恰恰是宪政之本。民初各派政治力量之党同伐异的独断心态，是与自由、多元、宽容的政治理性精神格格不入的，这不能不使民国模拟西方民主制的宪政建设徒具形式。早期民国的这种有名无实的民主宪政，表征着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冲突。因而，在民国引入西方宪政制度的同时，以现代民主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借以确立政治理性精神和民主规范认同，成为民初思想界的一项紧要课题。这也是杜亚泉民初政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元素，健全的政党政治是宪政制度运作的基础。杜亚泉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即预见到政党在未来中国宪政建设中的关键意义，并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之规范滞后的现状出发，揭示了确立理性化政党政治规范的课题。杜氏指出，政党与现代国民休戚相关。政党为宪政之产物，其意义在于表达舆论和国民利益，故政党必与他政党对立而后成。政党之种类，就主义而言不外保守党与进步党，此为英美宪政之通例，中国亦不能例外。进步保守两党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为健全的民主宪政所不可或缺。“进步过骤，则不免流于危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湾食货出版有限公司 1978 年，第 51 页。

险 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 保守过甚 则不免流于退弱 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若两党不失其平衡 则宪政愈形其圆满”。^①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政党功能殊互补，两者一进一挽之调节平衡的张力，是宪政结构的重要机制。

辛亥革命以后，新生的民国面临着深刻的政治秩序整合危机。刺杀宋教仁案以后，袁世凯的黠武弄权导引了共和派的“二次革命”，激进与保守势力干戈互见的对抗，使民国再陷动乱危境。政治秩序的失范，成为早期民国政治最深刻的危机。杜亚泉对这种激进与保守的对抗之局，以及由此加剧的政治秩序整合危机深怀忧虑，他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历史借镜，鉴取德国学者佛朗都的“接续主义”，而力倡进步与保守相调和的政治接续主义。在杜氏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接续而成的历史连续体，无论个人、家庭、团体和国家 皆赖接续以存立。“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反之，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故欲谋开进者 不可不善于接续。”^②杜氏对英美的盎格鲁自由主义传统赞扬有加，认为近世国家中，开进而兼能保守者，以英国为第一；美国政治亦多为英吉利政治传统的承袭。

政治接续主义之要义，在于开新与保守的平衡互动。然而，接续主义之“保守”并非“复古”的同义语。杜亚泉指出 所谓“保守”者 在不事纷更 而非力求复古。保守的接续 当国家扰乱以后 旧时法制若部分破坏者 则接续尚未全断者 护持之 若其破

① 《政党论》，《东方杂志》8卷1号。

② 《接续主义》，《东方杂志》11卷1号。